俞正聲「四不」為協商民主立規矩

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、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、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、上海市政協常委

■屠海鳴

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9月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：「必須構建程序合理、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，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、有規可守、有章可循、有序可遵」。在剛剛閉幕的全國政協全會上，俞正聲主席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，協商民主要做到「四不」：一是平等協商，不強加於人；二是眞誠協商，不敷衍了事；三是民主協商，不強求一致；四是務實協商，不流於形式。「四不」 為協商民主立下規矩，是落實「有規可守」的重要舉措，既展現出傳統文化中「和」的智慧，也體現了直面問題的「實」的作風，其作用將在未來的實踐中逐步體現出來。

今年全國政協全會是實踐協商民主「升級版」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首次大會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，提出協商民主要做到的「四不」，體現了協商民主的真諦。

「四不」明確了協商的基本準則

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，內地正在探索「協商民主」與「選舉民主」相結合的民主模式。「選舉民主」關注的是公民投票的權利，「協商民主」關注的是公民平時持續參與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。「選舉民主」是「多數決民主」，以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重大事項；「協商民主」是「共識型民主」，讓各個利益群體充分表達意見，是在諸多「少數」中尋找「最大公約數」。兩者如能互為補充，相得益彰，則能讓大事小事都能合理解決。

「協商民主」是從中國土地上「長」出來的。與選舉民主相比，它涉及的問題更多、更廣，情況更為複雜。在明確了「協商什麼」、「與誰協商」之後，「怎樣協商」也是關鍵一環。在實際操作中，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，偏激偏執的極端言論，觸及執政底線的各種思潮，都可能出現。如果沒有規矩，協商有可能走向兩個極端，要麼議而無果，陷於無休止的「扯皮」，要麼流於形式，淪為空談。

「四不」針對協商中容易出現的四個現象，明確了四條基本準則，着眼於「商以求同，協以成事」，有了這個準則，實際操作中才能做到「既暢所欲言、各抒己見，又理性有度、合法依章」。

「四不」體現傳統文化「和」的智慧

中華文化中有一個關鍵字：和。「家和萬事興」、「有事好商量」、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、「合則兩利，鬥則兩傷」、「 履不必同，期於適足；治不必同，期於利民。」等等。「和」所體現的是溝通而不是對抗，是包容而不是對立，是融合而不是分離。這也是中華文明歷經劫難而綿延五千年的奧秘。「平等協商，不強加於人」、「民主協商，不強求一致」，此兩條箴言就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「和」的智慧。

「平等協商，不強加於人」就是要有平等的姿態。今年「兩會」前，中共中央印發了《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》，協商範圍大幅擴大，包括七個方面：政黨協商、人大協商、政府協商、政協協商、人民團體協商、基層協商、社會組織協商。綜觀這七個方面的協商，都涉及到平等的問題。比如，執政黨的官員和其他民主黨派的人員坐在一起，平日習慣於「拍板」、「定調」的官員，能不能放下身段？就值得關注。如果居高臨下，目中無人，協商也就沒有了寬鬆和諧的氛圍，一開始就留下失敗的伏筆。

「民主協商，不強求一致」就是要有包容的心態。協商最重要的是尊重別人的表達權，讓各方都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表達出來，增進了解，才能加深理解、消除誤解、取得諒解。只有這樣，才能達成一致。因此，民主的氛圍非常重要。就算一時間不能形成共識，也不能強求一致，從長遠來看，也為日後的達成一致做了鋪墊。因此，在協商中，任何一方都要有包容的心態，任何「一言九鼎」的做法都應拒絕。

「四不」體現解決問題「實」的作風

「協商民主」既是一種價值觀，也是一種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。推進「協商民主」，既要有發自內心的認同感，又要有解決問題的務實作風。「真誠協商，不敷衍了事」、「務實協商，不流於形式」 正是體現了解決問題的務實作風。

「真誠協商」與「敷衍了事」有明顯區別。在選題上，是選擇涉及面廣、矛盾比較集中、民眾反應強烈的事情，還是無關痛癢的事情？在選擇協商對象上，是多與既得利益群體協商，還是多與弱勢群體協商？在程序上，是先協商後決策，還是先決策後協商？等等。「真誠協商」必然是直面問題，直指要害，「敷衍了事」必然是迴避矛盾，避實就虛。「務實協商」與「流於形式」同樣有天壤之別。「務實協商」是讓有關各方暢所欲言，無論是贊成的，還是反對的，都讓人家充分表達，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，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。「流於形式」的做法，則是心中早有一個主意，包裹早就裝着一個方案，把有關人員請來，只是做做樣子，這樣的「協商」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。不敷衍了事、不流於形式，兩條規矩不可或缺。

「沒有規矩，不成方圓」。處理世界上任何事情，都需要一定之規。俞主席針對協商民主提出的「四不」，摒棄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，拒絕偏激偏執的極端言論，保持從善如流的坦蕩胸懷，使議事有規則、協商有底線，其作用將會在日後的實踐中逐步顯現。

須更重視人口政策

顏汶羽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、觀塘區議員

■顏汶羽

香港經濟發展主要取決於兩個要素，一是土地，二是人力資源。土地在香港基本上是長期不變的，大部分土地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進一步開拓。因此，香港經濟需要依賴人力資源去發展。

政府需進一步重視人口政策，人口政策是其他政策的根本，人口數量和質量對香港相當重要。到了2018年，香港將面對勞動力不足、就業人口不足的情況，加上人口老化，令壯年人口需負擔老年人口的開支，衍生出退休保障、醫保計劃等社會問題。

香港出生率低，港人遲婚、單身比率高，令人口增長很低。政府透過新來港人士來港團聚，可補充香港人口及勞動力的不足。但新來港勞工與香港市場的需求有所差異，政府需要加強再培訓的投入，協助新來港人士在職場競爭。

政府應加大力度鼓勵生育。雖然財政預算案將子女免稅額進一步提高至10萬，但助力不足。政府應推出更多直接津貼及資助，以減輕年輕父母的經濟壓力，如推出兒童醫療券、生育津貼等等。

大部分的公共政策，如醫療、教育、交通、規劃發展等，實際上都是受着人口政策的影響。政府應估算香港需要多少人口，從而透過生育措施及移民政策，去將香港的人口調控至適度水平。其次，政府亦要檢視香港經濟體系需要哪種程度的教育水平人士，並透過教育、培訓及移民政策去調整人口質素。

香港人口增長持續偏低，在可見的將來，香港競爭力將會逐步下降，人均生產總值亦會因而下跌，這是每個香港市民不想看到的事！

「港獨」分子照搬納粹舊橋

黃熾華

一小撮「港獨」分子繼3月8日辱罵、腳踢、推倒內地和香港同胞的暴行後，3月15日又藉「賞花」到禮賓府搞事。綜觀「港獨」分子欲把香港推向「妖獸都市」邊緣的所作所為，他們實際上以希特勒為「魔魂」，照搬納粹黨舊橋來摧毀香港法治之核心價值，實現他們奪權的野心。

其一，以暴亂提高和名度。當年希特勒慣用通過對抗政府的挑釁行為，來提高自己的公眾知名度。1922年1月他發表演講、煽動暴亂，被控以妨害公共治安罪判入獄一個月，緩刑至同年3月執行；1923年11月8日，希特勒帶領一批納粹黨徒在慕尼黑舉行暴動，宣佈「全國革命開始」，自稱「德國首腦」，但輕判他罪行的主審法官奈德哈特，卻同情、傾向納粹分子。瞧今天的香港，不亦有政客屢以挑戰法治、施行暴力來提高曝光率嗎？「港獨」分子知道香港「原來法律」並無取締分裂國家行為的條款，基本法23條也未立法，故肆無忌憚地以「反水客」為名，以暴力驅趕內地同胞，製造族群分裂和仇恨，上演「港獨」醜劇。

其二，以白色恐怖反共。1932年7月，納粹黨雖然成為國會第一大黨，但席位仍未過半；到了1933年2月，納粹策劃並導演「國會縱火案」嫁禍共產黨人。時任國會議長、曾與希特勒參與「啤酒暴動」的戈林隨即逮捕共產黨議員使納粹黨控制了三分之二席位。現在看香港反對派政客，在梁振英當選後，不就仿效納粹高喊「抗赤」和「西環治港」製造麥卡錫白色恐怖嗎？「人民力量」更在立法會抗議「港共治港」；至於「熱血公民」和標榜「本土派」分子，更是藉反對簡體字和「反水客」配合公民黨「抗赤」、「光復」，煽動「恐共仇共」情緒，以便排斥建制派和愛國愛港力量，騙取選票，手法抄足納粹黨之所為。

其三，以輿論分離族群。當年「頭號反猶太煽動家」施特賴爾在反猶太刊物《衝鋒隊員》連續鼓吹把猶太人「斬盡殺絕」，咒罵猶太人是細菌、瘟疫、蝗蟲；而希特勒又用「民族主義」否定民族融合，用「極權主義」否定政治民主，以日耳曼民族是「最優秀民族」來麻醉、欺騙德國人民，以此籠絡到大批選票擁他上台。今天「港獨」分子也照辦煮碗，以「本土化」包裝，捏造出一個子虛烏有的「香港民族」。反對派喉舌爛果日報也鼓吹「香港人唔係中國人」，配合此等謬論，「港獨」分子在上水、屯門高喊「中國人滾回去」的「驅蝗」行動，手法如出一轍。

由此可見，香港「港獨」分子完全按當年納粹黨的倒行逆施來製造混亂奪取政權，要把香港推向災難深淵。張德江委員長要我們守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條紅線不能觸碰，也就是守護香港繁榮安定的底線。香港人必須行動起來，堅決揭穿反對派和「港獨」分子的納粹陰謀和暴行，刻不容緩！

反對派聯署聲明意在「政治勒索」

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

政改步入關鍵階段，目前社會各界均盡最大努力凝聚共識，力求能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。反對派不但拒絕合作，反而進一步激化矛盾，再次發表綑綁式聯署聲明，表示只要普選方案是在全國人大「8・31」決定下進行，他們就要反對，並將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，令普選方案無法通過。這種政治勒索只會適得其反，暴露反對派無意溝通，扼殺普選的眞面目。社會各界應團結一心，廣泛動員，努力凝聚共識，爭取政改方案通過。輿論更要大力呼籲反對派及早「回頭是岸」，構建溝通渠道，爭取溫和反對派支持。民意是實現普選的最大動力，立法會議員需要負責任地投下自己的一票，否則將被民意淘汰。停止政治勒索、停止對抗，為港人選擇合憲合法、切實可行的政改方案，這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所在。

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均表示堅定支持香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，並強調普選必須依據憲法、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在去年8月31日對政改所定下的框架進行，為普選制定方向，指明道路。反對派無視國家憲政，公然叫囂要人大收回決定，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對着幹，激起社會的強烈憤慨。

自香港啟動新一輪政改以來，中央政府立場始終不變，就是堅定不移地依法推進政改，爭取於2017年實現特區行政長官普選，讓全港選民能夠「一人一票」投選心目中的行政長官，並在之後繼續循序漸進推進民主。特區政府亦多次表示，民主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香港在回歸後民主發展一日千里，如今有機會落實普選，正是「機不可失、時不再來」，港人應認清現實，抓住機遇，合力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進入新里程。反對派推翻人大決定、否決政改方案的行為，不僅違憲違法，更違背民意，是赤裸裸的「政治勒索」，社會須作出最義正嚴辭的譴責。

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不容挑戰

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本月15日的總理記者會中，回答香港記者關於「中央政府是否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」的提問時指出：「一國兩制是國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願，是不能輕易改變的，中央政府會繼續支持香港特區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，會繼續加大對香港的支持力度，發揮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」。他表示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是中國政府的基本國策，「擔心中央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沒有必要。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指明，在港澳問題上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，基本法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，「一國兩制」被寫進了憲法和基本法，不能輕易改變。

由此可見，中央政府在港澳事務上的立場政策始終如一，在推進香港政改的進程更是如此。中央堅定不移支持落實香港特首普選，前提是「依法辦事」，這也是一以貫之、行之有效的基本國策。反對派卻一意孤行，公然挑戰國家政制、人民意願，發佈不切實際的「聯署聲明」，叫囂要人大收回「8·31決定」，又狡辯「政改通不過也不關他們的事」，這不僅是赤裸裸的挑釁，更是推卸責任的行為。

破壞商討氛圍斷送普選機會

目前特區政府官員、各界人士包括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紛紛發聲，呼籲反對派在法律範圍內推動政改，希望他們停止不合作的破壞行為。但反對派置若罔聞，在政改敏感時期發表「聯署聲明」，破壞商討政改的氣氛，很可能斷送來之不易的普選機會。

■張學修

反對派採用綑綁方式發表聲明，也說明反對派內部意見不統一。反對派為了給中央及特區政府製造壓力，造成要挾效果，採用粗暴的綑綁方式，不僅強制干涉議員的選擇權，更剝奪了這些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。現時的情況是，激進反對派綑綁了中間派，溫和派難有表達意見的空間，結果只會讓對立形勢更為嚴峻，政改方案得以通過的可能性進一步拉低。

否決政改方案違背民意

反對派不斷拋出激進違法訴求，將政改推向難以落實的境況，卻又表示政改不通過不是他們的責任。他們一方面用盡各種手段阻止政改進程，另一方面又將破壞普選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，把香港的前途「擺上枱」，不惜令香港的民主發展乃至社會整體利益來個「玉石俱焚」。這樣的言行不是「政治勒索」又是什麼呢？反對派眾議員綑綁發表「聯署聲明」，否決政改方案，不僅不能向香港社會交代，更難以向選民交代。主流民意已多次清晰表達，期望能夠依法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，期望議員能夠順從民意在立法會投下莊嚴的一票，反對派議員如不肯回頭，枉為民意代表。

反對派綑綁發表「聯署聲明」也傷害兩地的互信關係。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祖國的支持，離不開中央的照顧。脫離「一國」大前提談香港發展是沒有意義的，在政改問題上，更應堅持在憲法、基本法以及人大「8·31決定」下落實行政長官普選，如此才能保證香港的發展不走彎路。反對派議員無視國家憲政，挑撥離間兩地關係，走上死胡同，絕不會有出路。

「村山講話」成安倍欺世「緊箍咒」

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

西方走廊

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，特別提醒日本「無視過去就看不到現在」，只有反省，才能得到鄰國的信任和接納。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，北京將舉行包括閱兵等系列紀念活動，以提醒各界不要忘記歷史。安倍近年來小動作不斷，既修改憲法、解禁自衛隊，又多次否認「侵略」，證明安倍是沒有誠信的不老實政客。北京舉行矚目的紀念活動，默克爾的善意提醒，日本民眾的正義呼聲，共同構成對日本右翼的強大壓力。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8月的「村山講話」及最近警告，更加成為安倍欺世的「緊箍咒」。

1994年村山出任日本首相後，訪問了中國、韓國和東南亞多國，感受到曾經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，正在擔心經濟復甦後的日本是否再度成為軍事大國。村山決定，必須通過徹底清算歷史，與周邊國家結成互信關係，才有利於實現共同發展。翌年，村山富市發表了「承認日本曾經實行錯誤國策，走了戰爭道路，並表示要深刻反省歷史、吸取歷史教訓」的「村山講話」。村山當時強調「日本曾給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和痛苦，也讓日本自己因此陷入了存亡危機，只有認清這段歷史，才不會重犯錯誤」。

20年後的今天再發警告

「村山講話」實事求是地對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進行了反省，獲得日本周邊國家的認同。隨後日本與中國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、與韓國也進行了較為密切的文化交流。「村山講話」寶貴之處是東京政府對日本在二戰時期的殖民統治表示反省和歉意，對維護亞洲地區穩定，走共同發展道路方向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。正如村山特別強調的，當年的「談話」是日本向亞洲乃至全世界作出的反省和承諾。任何人、政黨如果想修改、否認「談話」，將導致日本再次陷入孤立，並永遠無法在世界上立足。

村山富市近日就安倍打算修改「村山談話」向日本右翼發出警告：日本對中國、朝鮮半島進行的殖民統治和侵略，給多個國家帶來傷害，是鐵一般的事實，缺少這些關鍵字眼，將招致世界對日本的懷疑與不信任。日本要想獲得中國等亞洲人民的信賴，就必須徹底清算歷史，承認對他們的「殖民統治和侵略」，並進行反省道歉，才能表達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。「村山談話」之所以得到了歷屆內閣的繼承，是因為日本政府向世界作出了鄭重承諾。修改、違背這一承諾，日本最終將孤立於國際社會。

東京右翼正在篡改歷史

2014年7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會議，審議日本有關落實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報告，「慰安婦」問題成為焦點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專家馬約迪納表示，日本沒有詳細解釋日本在「慰安婦」問題上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，也沒有提供信息，應該採取了哪些法律和行政措施，以向「慰安婦」制度的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賠償。村山也曾經表示，日軍慰安婦問題需通過韓日首腦會談來解決，最好是由雙方商定共同研究解決方案，主張日本政府應向慰安婦受害人進行賠償。

安倍的親信、自民黨黨首特別助理萩生田光卻在近期狂言：日本不存在「戰犯」，也不存在強徵隨軍「慰安婦」。萩生甚至橫蠻無理地說，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軍人的判決是錯誤的，我們要向國際社會宣傳日本並沒有戰犯」。萩生甚至公開指責《朝日新聞》的有關「慰安婦」報道「捏造事實」，讓日本國家利益受到巨大損失。萩生更加叫囂，國際社會應該「恢復日本的尊嚴」。安倍、萩生等日本右翼的言行，向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，那就是東京右翼正在篡改歷史，顛倒是非。